

尖銳筆墨 爭取光明

——记子民图书室的诞生

罗歌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学生运动的迅速高涨。北平地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形势要求更加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育更多的爱国青年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

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经过“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后，形势大好，进步同学迫切需要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地下党也正发动成立各个社团，以适应新的形

势，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大量的进步读物。北京大学的图书馆藏书虽然丰富，但它封存了“五四”以来收藏的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的书刊。这个图书馆可以花费九百六十万元购置一部明版《水经注》，却不愿花钱订一份上海《文汇报》。因此，地下党决定要迅速成立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报纸的图书室。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民图书室光荣诞生了。它在北平地区的学生运动中起了宣传母机的作用，不仅在华北地区有着影响，而且在华东、香港都有深远的影响。子民图书室存在时间虽很短暂，但在中国现代

图书馆事业史册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作为这个图书室的最早的主持人之一，有责任将子民图书室的历史写出来，以供研究参考。同时，四十年代的这一群非专业的年青的图书馆工作者白手起家、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是今天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图书室恨之入骨，但又没有办法公开进行破坏，因为这个图书室是以纪念蔡元培先生为名建立的。由于这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享有崇高的威望，进步的社会人士、团体都支持这个图书室，北京大学的教授、职员们也都热情援助，至于北大的进步同学更是欢欣鼓舞地庆祝它的诞生。因此，子民图书室从它诞生起，就具有站得住、办得快、搞得活的特点。

一九四七年九月，新学年刚开始，一个地下党的同学来找我。那时，我们这些党外积极分子和地下党员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们中间只隔了一层纸，谁也不去捅破，彼此心中有数。

他对我说：我们想搞一个图书室，主要是通过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的书刊来教育广大的同学，包括中学生在内。为了能站得住，就不能只收集进步书刊，反动的也要，你看，这件事该不该办？如果该办，你和我来筹办一下，如何？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我们就商量叫个什么名？从十多个名字里，挑选了两个：“五四图书室”和“子民图书室”，看来，“子民图书室”更好。以纪念蔡元培先生的名义而设立的这个图书室可以站得住，符合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北大学生自治会即通过第八项决议：“为了纪念已故校长蔡子民先生，承继兼容并包的精神，收集各种书籍，培养自由研究的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决

定成立孑民图书室。”

决议通过的第二天，那个地下党员给我一颗园形的“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孑民图书室”的橡皮图章。

他高兴地说：“这颗章交给你了，你就是这个图书室的负责人，找房子，要傢俱，募图书，……白手起家，全靠这颗图章了。现在，你赶快到训导处去办理手续吧。”

当时，北大训导处为了控制学生运动，规定凡成立社团、办壁报……都要到训导处登记，便于他们追查。因此，各社团、壁报的负责人都尽可能地找一个非党员去办手续，这样，便于保存党的力量。

到了训导处，我填了一张表，并盖上一个章，表示今后孑民图书室的用章以此为据。填完表，训导员鄙夷地说：“这个图书室在那里？藏书多少？何时开幕？……”接着，他一阵狂笑。我气得直哆嗦，掉头就走，找到那个党员，他听完也一阵大笑说：“别着急，一切都会有的，咱俩来一件件办吧：先说房子、傢俱，这找胡适，书籍嘛！咱们来个募捐运动，……你看，如何？”

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呈递胡适校长要房子，要傢俱的报告。

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手持学生自治会聘请胡适担任孑民图书室名誉顾问的聘书和要房子的报告来到胡校长公馆（沙滩附近的东厂胡同），看门的一看校徽，听我自称是学生代表，很客气地把我请入客厅。这显然是胡适校长的吩咐：对于本校的学生代表，都以礼相待。他竭力表明自己是“学者”，而不是“官僚、政客”。

胡适一听说这个图书室的成立是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而且聘请他担任名誉顾问，他打断了我的介绍，即连声喝彩：“好，好”，看他那敬仰蔡元培先生的神态，不管是真是假，我就接着说：“但是，直到现在，孑民图书室还没有立足之地，没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胡适说：“这个要解决，一定

要解决。这是纪念蔡先生嘛！这个，这个我支持。”我递上要房子、傢俱的报告，他批了几个大字：“由总务处即办，胡适”

我一看，目的达到，不再多说，告辞了。

第二天，找到总务处，拨给我们一间四十平方米房子，即红楼一楼西头167号，还给了书柜、书架、阅览桌、椅。傢俱算齐了，我们又找了六个中文系、西语系的同学来参加孑民图书室的工作。

十月七日，我们八个人开了第一次干事会，会上，大家议决了三件事：（一）聘请卅多位教授，担任我们的导师。（二）油印了一千多份捐册，发动“敲门运动”，敲教授的门，敲职工的门，敲同学的门，不管中、外、古、今，不论反动、进步，只要是书，都在募集之列。（三）还在校内外发动捐款，作为本室的基金。

会议一结束，我们八个人即分头去办。

书，一本一本地多起来，一批批来自教授、讲师、助教、职员、同学手中的书刊集中起来了，大家都说：“丝糕啃不饱，精神食粮却需要。”伙食团把节省下来的伙食费捐了出来。十月十五日，我们已经募集到一千多本图书了，于是参考了北大图书馆的编目法，自己弄出了一个简明的编目法，大家一齐动手，写号、贴标、贴口袋、盖章……流水作业，用了四天时间，编目工作就完了。十月二十一日，孑民图书室在红楼一楼167号正式开幕了。

开幕前夕，我们在孑民图书室的正墙上挂上蔡先生的画像，并写了一段蔡孑民的语录：“若为永久唤醒同胞，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格必难幸致”。

开幕这天，我专门到训导处通知那位训导员说：“本图书室地址在一楼西头167号，藏书一千二百册，工作人员八人，今天正式开幕，请光临指导。”这位训导员目瞪口呆，一言不发了。



开幕以后，图书室工作人员已有二十多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图书室天天开放，大家轮流管理，都是利用课余时间，要做到紧张而有秩序，很不容易。于是我们召开了一次大会，通过了《子民图书室组织大纲》（略）。

根据这个组织大纲，还制定了《子民图书室工作手册》，详细规定了所成立各股的工作细则及其分工合作。最复杂的是管理，要求它一点不乱，没有严格的制度是不行的，而有了严格的制度，没有高度的自觉性也是不行的。因此，子民图书室的罚款制度是严格的，工作人员迟到、早退要罚款，罚款就用来购置图书，因此，我们违反了制度，甘愿受罚。那时，大家很穷，往往罚了款，就有好几天吃不上早点。

地下党经过研究，如何启发教育更多的同学参加民主运动，子民图书室就是一个很好的基地。它容易吸引广泛的同学参加，但到了子民图书室以后，就不仅仅只是做一些管理图书的工作，子民图书室还有自己的学习小组：有文艺小组、社会科学小组、时事小组、生活小组、这些小组都定期学习进步书刊，定期讨论，定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子民图书室还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图书与学习》，由资料股主编，每个工作人员都

要写稿，内容有：纪念子民先生、书评、新书介绍、出版消息、本室各股工作报告、读者来信等。这个小刊物，很受大家欢迎。子民图书室通过这些进步活动，不断提高了一批一批参加图书室工作的同学的政治觉悟。在这个图书室工作过的几百个同学中，不少人于一九四八年分批去解放区，不少人坚持了在北大的地下斗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子民图书室也起了培育党的干部的作用。

子民图书室开馆后，我即转到募集股，随即起草了一封信，投向全国有名的书店、杂志社、作家和文化界的人士。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先生：

我们北大学生为了纪念蔡子民先生，承继兼容并包的精神，收集各种图书，培养自由研究的风气，发扬民主科学的传统，因此，设立了子民图书室。

现在子民图书室已经成立了，由于文化界各位导师们的援助，本校全体师长同学的支持，它已经逐渐壮大起来，但是在北国文化荒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精神粮食的它，仍旧是太贫乏了。因此，我们恳请你们给我们有力的支援和帮助。

为了解决目前青年学生中普遍的精神饥荒，为了防止北方黄色逆流的泛滥，你们一定会同情和支援我们的。

现在，我们向各位呼吁：无论新旧书籍或报章杂志都希望你们能捐给本室，多少不计，我们在这里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你们的礼物。

最后，我们谨代表全体北大同学向你们致崇高的敬意！

子民图书室敬启

我们还通过子民图书室的卅多位导师替我们写了不少介绍信，发向全国的作家、出

版家及文化界人士，信的内容基本同上。

这些信发出后，支援的喜悦很快从全国各地传来了，作家来信了，出版家来信了，书店来信了，杂志社来信了……一包一包的新书不断寄来，四十多种杂志相继寄来。那些日子，我们募集股的三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忙着拆封、登记、复信；编目股也忙着编目；管理股的工作更加繁重了，民主墙上天天有子民图书室的喜报，大批的同学，职工，甚至于教授、讲师也都要来看看这些新书报、新杂志。这些新书报不仅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没有，而且在全北平市也很难找到。

一九四七年十月卅一日，许广平先生给我们写了第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逄复者奉到大扎，嘱捐鲁迅著作以充实贵室，自应尽力，敝社印行鲁迅全集早已售罄，无以应命，三十年集尚可设法，但恐邮汇延迟，且策安全，最好由贵校有办公人员南下之便（如胡适之先生时常往返南北），便凭函来取，当即奉上无误，此致子民图书室

许广平启十月卅一日

许广平先生及时送了我们一部《鲁迅三十年集》。但她对于子民图书室的性质还不了解，因此，我们立即给她回信，并附上我室章程以及我们学生自己办的刊物，立即接到她的第二、三封回信：

逄复者顷奉到贵室惠函及邮费拾万元，经已妥收，除付邮费外，尚余邮资85800元，兹特随函附上敬祈查收，示复为荷。此致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子民图书室
许广平启十一月十五日

子民图书室诸位先生：

十月廿四、十二月九、十

二、各函统拜收，图书室章程及北大新闻等亦先后收到。先生等不遗在远，从各刊物中使我重新呼吸在学术氛围之下，如同置身于“民主广场”中，一如以往，追随各先进同学参加运动，前尘近影，溶合一炉，感怆之情，深以未克努力为惧，所幸以后源源得读贵处期刊，藉他山之鞭策，图异日效驱驰，即作执鞭，或不我弃欤？子民先生孕育群才，为国奠基，今有图书室之设，允宜合力支持，倘有便人，当更书献（邮寄不便），昔鲁迅先生对北大亦拳拳致意，广平不敏，当敬体各先哲遗教，肃此布臆，并致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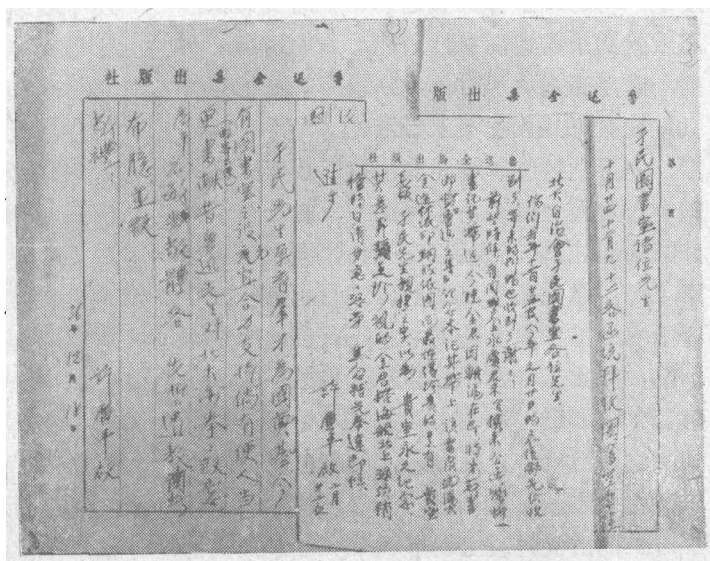
许广平启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

日

许广平在这封信中，充分表达了她对子民先生的敬仰，对我们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支持，她这时已经很了解子民图书室。因此，地下党决定在放寒假时，派金永庆去找她，面述我们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她回了第四封信：

北大自治会子民图书室各位先生：





你们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及今年元月廿日的来信都先后收到了，寄来的刊物也收到了，谢谢！前些时后，有同学金永庆君来舍，携来公函，嘱将书托其带返，今晚金君因离沪在即，特来取书，即将《鲁迅全集》纪念本托其带上，该书皮面烫金，道林纸印，铜版纸图，而最值得珍贵的，是有贵室长故 子民先生亲题之字，以为贵室永久纪念，其意义弥足珍视的，金君搭海船北上，恐须稍稽时日，请毋急急，恐劳焦虑，特先奉达即候进步！

许广平启二月廿二夜

接到这封信不久，金永庆同学将这部珍贵的书带来了！据金君介绍，用这种楠木匣装的《鲁迅全集》纪念本全国只有二部，一部送我们，一部由许广平自己保存，最珍贵的木匣上有蔡子民先生亲笔题签《鲁迅全集》纪念本共七个字。而蔡子民先生题签的第三年，即病逝于香港。这对于子民图书室来说，是最有意义的珍品了。因此，我们将这部珍品放在民主广场公开展览了三天，吸引了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和同学，也吸引了北平市的一部分中学同学。

此后，我们与许广平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更重要的是，她对于北大的民主运

动也发表了很宝贵的意见，如她的第五、六、七封回信：——

惠书收到，承询《北大半月刊》是否能按期收到，兹查得1、4、5、6、7、9、均先后收拜，特此致谢，对于最近一期取材精

审确当，锋利明正，殊足以称北方辰星，近来上海出版界零落，得此殊饱眼福，观后振奋之情，油然而起，恨不得已身能到北方，吸此清新气象也，敬祝努力！

许广平启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

九月九日惠函奉悉，《北大半月刊》第八及十、十一合刊，又《图书与学习》均先后拜收，谢谢！《北大半月刊》持论公正，报导确实，对同学砥砺固极适当，对落后于时代青年的我，读之更似服清凉剂、定心丸，相信中国前途无限希望在诸君身上也，但树大招风，德高毁至，尚望随时祥光稍敛，以减注意，也许身居南土，不觉其胆怯言多欤，肃此敬候近祉

许广平上一九四八、九、廿一

迳复者九月廿七日惠书已到，承嘱写稿，于十月一日出版之《北大清华联合报》刊登，一则时间赶不及，二则我以为贵刊今后最好向平正方面着手，争取一般同学受益，不使它影响到人不敢手一篇（最好另外有读物），公开合法，

然后可以作为课外或失学（如流亡同学）者之助，因此，我以为如我的措词欠涵养功夫的，也以不载为是。先生们想能谅之也，子民图书室周年纪念足可致贺，敝处并无新版书，无以为助也。此致子民图书室诸君公鉴

许广平上十月八日

一九五〇年秋天，许广平从上海来京，文物局请她审查北京鲁迅故居的复原修缮工作，那时，我正在文物局，领导上让我陪同她工作，我曾提及子民图书室的事，她记得非常清楚，我把她捐赠《鲁迅全集》纪念本一事在当时起的巨大作用告知她时，她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当时用纪念蔡子民先生的名义来办图书室，最得人心，最能站住脚，我也是蔡先生的学生，当然要支持你们。我当时把这部《鲁迅全集》纪念本献给子民图书室，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以摧毁子民图书室，这部珍品随时会受到破坏，但是想到你们收藏这部书后，一定会在当时的民主运动中起着鼓午同学们的作用，所以，我决定送给你们”。

在上海的进步作家们也支持我们，巴金先生就是最积极的，他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五日回我们一信：

先生：信收到，健吾、家璧诸位信也已转去。书可以捐出一部分，过两天当陆续寄上。怕您惦记，先写这封信告诉您。我生活忙乱，什么都做不好，所以您的信收到好些天，我还没有能把事情办好，请原谅。祝好

巴金十月廿五日

过了些天，我们收到了他寄来的《家》，《春》、《秋》等著作，我们将邮费五万元寄去，十二月六日又接到他的回信：

子民图书室诸位先生：信收到，你们太客气，捐点书算不了什

么，以后请不要寄邮费来，这五万元邮票收下了。我一共寄过两包书，两包书寄发时间隔得不近。我生活乱，办事容易忘记，有时想起，便找出几本书来托书店办事人寄出，以后还预备寄上一些书，好在你们办图书室，什么都可容纳。我的书以后当寄上一部分。你们寄的书收到，谢谢。勿复，祝好。

巴金十二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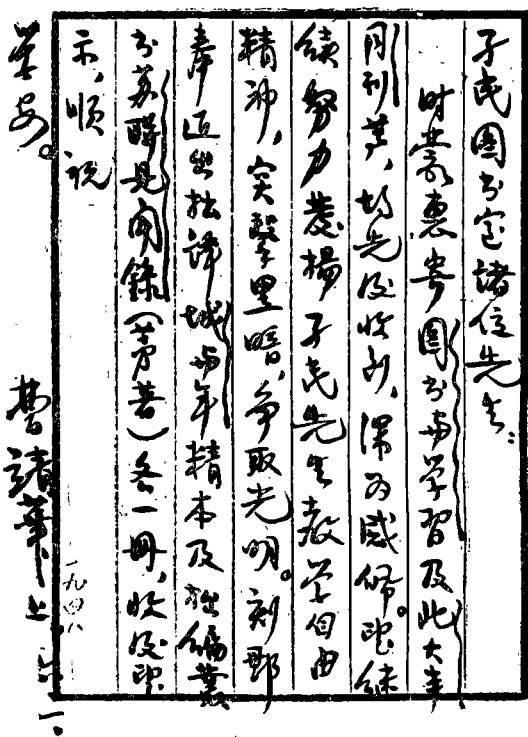
在南京，曹靖华先生来信鼓励我们，他十分赞同在当时要发扬子民先生主张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他在回信中写道：

逄复者：十一月廿七日来函敬悉。诸位创办《子民图书室》，发扬子民先生教学自由、研究自由精神，在今日尤为切要。刻检奉手边现存之拙译及拙编书十部：计：《望穿秋水》、《死敌》、《梦》、《恐惧》、《虹》、《铁流》、《保卫察里津》、《俄罗斯问题》、《团的儿子》及《巴黎的陷落》，用寻常挂号寄上，来日收到后，望祈示知，以免悬念。所寄书内有数册为渝土纸本，印制虽劣，但对战时后方文化活动，颇具纪念意义也。敬复北大子民图书室。

曹靖华一，十，南京

靖华先生给我们的书中，有几本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的土纸本，那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他极热心，不断寄来好书，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他又来一信：

子民图书室诸位先生：时蒙惠寄《图书与学习》及《北大半月刊》等，均先后收到，深为感佩。望继续努力，发扬子民先生教学自由精神，突击黑暗，争取光明。刻邮奉近出拙译《城与年》精本及拙编丛书《苏联见闻录》（茅盾）各一册，收后望示，顺祝学安。



曹靖华上六，一，

在北京，朱自清先生在病中还给我们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诸位同学：《北大一年》和你们的信都收到了，谢谢！我愿意送一本《新诗杂话》给你们，但现在还未寄到。别的书我手边也只有自存的一本，不能送了，抱歉！你们的信我写出三封，一封给作家书屋，一封给文光书店，一封给臧克家先生，有效与否，我不敢说，不过我尽我的力罢了。祝好！

朱自清一，廿八

在此期间，金仲华、冯宾符、李广田、臧克家、王重民、俞平伯、曹孟君、平心、范泉、张申府、李桦、葛一虹、叶圣陶等作家、出版家、本刻家等都热情地回了信、送了书，至于各大书店、出版社、报社，如新知书店、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朝华书店、中华书局、东方杂志社、时与潮社、观察社、现代妇女社、文化服务社、正

中书店、进修社、希望社、交通书局等都寄了他们出版的书刊来。在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馆送来十九种书，计《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关系》、《苏联新五年计划》、《苏联木刻》等，美国新闻处北平分处也按期寄来新闻稿，英国大使馆也送来书刊。

以后《大公报》社在报上发表了一条新闻《红楼徵书》，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映，在香港的北大校友看到这条新闻后，又在《华商报》登了启事，收集到图书一〇三册，美国杂志三种。香港达德学院为孑民图书室募书一百多本。

由于孑民图书室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平心先生来信，他准备建议在上海大学中也筹办一个“孑民图书室”，南北并存，互相竞赛，而北京师院也在一九四八年办起“行知图书室”，汇文中学也办了自己的图书室。香港的“进修图书馆”经常来信，交流工作经验。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香港进修图书馆来信：

孑民图书馆同仁：

十一月三日的信和附件收到了，万分高兴！因为从开放以来，整天的忙着，没有写回信，真是抱歉的很！

看了你们寄来的油印品，使我们起了无限的敬意，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事业来，如果人间有“奇迹”，这就是！在这里，我们谨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敬意！

“进修”是文协香港一分部，书职及几个青年团体所襄力创办的。香港战后人口达百六十万，可是没有一个图书馆，能为港口读者出借书刊的，可以想象情形的严重和可怕，但是“进修”是成立了，稚弱的年龄却经不起风浪，没有经费，没有经验，迫切要求同业和读者的匡

助，看到你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带给我们勇气和信心，“进修”将会壮大，站得住脚跟！

另邮寄上《文艺丛刊》两本，以后如出版，当继续寄上，专此即致敬礼！

香港进修图书馆启

十一月廿一日

上海中华业余图书馆来信：

逄复者：接到你们的信，现在寄上一些赠书，书当然很少，也不是怎么好的，希鉴谅。书另邮寄上，请查收。我们很希望知道你们的最近的情形，并且希望今后经常有点消息来往，也可以做为工作上的借镜。祝快乐此致

孑民图书室 台鉴

中华业余图书馆启

五月廿五日

可见，小小的孑民图书室已在华东、香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三月，藏书从一千二百册飞快地突破为四千大关，报章杂志从七、八种增至六十种。平均每日借书人次一〇八次。

读者范围从校内发展到为全市的中学同学开放。在四月一个月中，中学同学申请借书证的已达八百人，后来图书室还为他们设立了信箱，为他们解答学习上的疑难问题。每天从早上图书室一开门，读者就挤满了，阅览室太小，很多人靠着墙壁，倚在窗角上，手捧书刊，仔细阅读，读者中有各系的同学，也有教授、职员、工友，其中来得最多的有冯至教授等。冯至教授常来翻阅诗坛、文坛的新出版物。当时人们称它是“北大人的精神粮仓”其实，它已成为“北平学生的精神粮仓。”

由于藏书不断增加，管理股增加到四十多人，分为修书、催书、借书、统计等组；资料股分为整理、研究、出版三个组。出版组最活跃，负责出版《图书与学习》（对

外，月刊）、《工作与生活》（对内，周刊）、《学习》（对中学读者）等。此外为了适应向中学同学开放的需要，图书馆还成立了读者服务股，办理分发借书证、代购代销书刊等工作。这样，全图书室工作同学已增加到八十多人，他们日夜为这个粮仓辛勤地劳动。

一九四八年“五四”青年节，也是北京大学校友返校节。

孑民图书室从开幕到第二年“五四”，已经维持了六个多月，经费都来自关心孑民图书室的教职员、工、警和同学。当时，一般职员月薪最高者五百万元，最低的三百八十万元，校警每日才一百二十万元左右，只够每天买二斤棒子面。尽管如此，支持孑民图书室的例子不少，如向达教授把他写的文章《介绍一本被遗忘的书》的稿费全部捐了出来，孙楷弟先生身患重病，同学们捐了一些钱给他治病，他却转送给孑民图书室。但是如果只限于校内募捐维持孑民图书室的经费开支、仍是困难的。因此，地下党决定，在“五四”返校节来一次大募捐。

孑民图书室在这一天印发了《五四募款特刊》，上面有介绍孑民图书室的短文，有孑民图书室的卅多位导师的名单，有支援过孑民图书室的廿一位作家、十二家书店、二十六家杂志社、三个大使馆的名单，最后是给校友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我们在校同学为了纪念故蔡校长，承继兼容并包的精神，收集各种图书，培养自由研究的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因而成立孑民图书室。

孑民图书室成立以来，已经六个多月了，一直是在各界人士与全体师长、同学的支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但是由于在校师长同学的经济能力有限，所以，它的藏书还是异常的贫乏。

现在我们发起‘五四募款运动’，除了向全体师长同学呼吁捐款外，我们不得不仰赖您们的支援和捐助。”

这一天，重点是向返校的老大哥、姐募款，由于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仰，对子民图书室工作的关心，都能慷慨解囊，校友何思源先生捐一百万元，校友吴铸人捐五十万元……这一天，共收入六千五百多万元。

这次大募捐，不仅在物质上给图书室很大的资助，添购不少新书刊；而且在精神上，再次注进新的活力，使子民图书室得以更加坚实巩固。

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一日，是子民图书室一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子民图书室已有藏书五千多册，刊物一百三十二种，二千四百多册。我们为周年纪念出了特刊，办了展览，向校内外，广大读者宣传了子民图书室一年来的战斗历程。

子民图书室发表《‘一年历程缩影’——子民图书室一年来工作报告》，此文将子民图书室一周年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段：创办（1947.9.——1947.10.21.）；第二段：苦撑（1947.10.21.——1948.3）；第三段：发展（1948.3——1948.6.）；第四段：

巩固（1948.7——1948.10.21）。这四个阶段中，后两个阶段是相当艰苦的，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逮捕以后，这里工作的同学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英勇善战，迎来了北平的春天。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北平和平解放。

从此，北京大学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北大图书馆已完全担负起为全校师生员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书刊的任务，子民图书室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它的那些富有纪念意义的藏书、刊物，已由北大图书馆珍藏。

以蔡子民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图书室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史上，在北平地区民主爱国运动史上，是值得纪念的。我们每一个参加过子民图书室工作的同学回忆这一段战斗历程时，也感到无限欣慰，因为我们在地下党领导下曾为而突击黑暗，争取光明而贡献出全部力量。

附记：我原名田觉狮，一九四八年三月离开北大，此后的情况，全凭北大图书馆珍藏的档案资料编写。特此说明，并向北大图书馆致以谢意。

蔡元培热心赞助进步事业

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要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启事，招收会员。据罗章龙回忆：蔡元培先生同意登刊，并亲自出席该研究会成立大会，发表讲话。该研究会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

节自高叔平《“五四”前后的蔡元培》
（载《百科知识》1980：4）

蔡元培著作和传记出版简况

最近，中华书局委托高叔平先生着手编辑出版的蔡元培著作和传记——《蔡元培集》、《蔡元培年谱》和《蔡元培传》预计近年内即可出版。

可喜的是，在蔡元培后人热情支持与积极配合下，《蔡元培集》编者最近得到了查阅和利用蔡元培故居所保存的资料的机会。蔡元培故居珍藏的资料相当丰富，已发现有蔡元培自订年谱稿、日记、殿试考卷、来往书信、诗文、序跋等具有较高价值的新鲜史料。

（节自《人民日报》1980.3.4）